

歐洲司副司長四年半

外交生涯（十六）

● 劉達人（前駐菲律賓代表、駐希臘代表）

職務調動派任新職

一九六〇年十二月十七日，我奉命調到外交部，但因陳之邁大使兩度奉派參加聯合國文教組織（UNESCO）大會，及另一國際會議，時間是一九六一年一至三月、五月至六月，陳大使不在館期間，我必須留下來代理館務，因此回到臺北已是一九六一年八月。記得向人事處長黃克綸報到時，他問：「為什麼調部半年後才回來？」頗有責備之意。事實上是外交部要我代理館務，可能人事命令較多，他忘記部裏要我代理館務乙事。

我以一等祕書回部分發情報司（後改稱新聞文化司）辦事，時新進同仁很多，在司裏有金樹基、林基正、郭清華、王國

銓等。司長是沈劍虹，他因兼蔣中正總統的翻譯，工作繁忙，不常在司裏，遂由幫辦魏煜孫負責司務，我則代理魏幫辦的工作，但此並非正式職務。當時全司共佔三個房間，彼此常走動，同仁都不拘束，大家友誼頗好。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七日，改派任外交部專門委員兼歐洲司幫辦，一九六四年二月，改幫辦職稱為副司長，此乃國內人事行政制度之創舉，於是成為外交部一固定的中級職位。直到一九六六年，我奉命外調義大利，此次回部共計四年七個月，其中有關中法斷交及三次出差琉球值得加以回憶。

中法斷交案件始末

九年十月一日首先承認中共，翌年一月六日英國與我斷交；不過自從政府遷到臺北以後，雖有許多國家與我斷交，但是法國為第一個即將與中共建交的重要國家，我政府當局當然重視，努力進行挽救工作。除自行向法國政府交涉外，並請美國幫忙，前後歷時年餘，但當時法國總統戴高樂（Charles de Gaulle）大權在握，他亦自認與蔣中正總統友誼深厚；因大戰期間他流亡英國倫敦時，我駐倫敦新聞處長葉公超常與之聯繫，且政府不時給予聲援；西元一九四四年，戴高樂成立臨時政府時，我政府隨即予以承認，並在重慶設立外交機構，我們視之為盟邦。一九六三年初，法總統曾致一函與蔣總統，表示他個人與總統友誼固存，對總統的作為甚表欽佩，但

中期待我政府返回大陸已十多年，而未見實現，時不我予，只好承認中共統治中國大陸之事實云云。日後亦不時有信給蔣中正總統以表友誼和欽佩，他的信文辭並茂，富有詩意。有一次外交部為寫回信，特別電召駐法國公使代辦陳雄飛回國面商機要，及另一位法文頗佳的前駐黎巴嫩大使王季徵回部辦事，由這兩位大使撰稿為總統回信，足見我方之重視。

我國為中法案十分努力，當時洽請美國幫助，其駐華大使賴特（Jerald Wright）是一位海軍上將，為職業軍人，說話很直爽，他按照華府的建議囑我方遷就兩個中國之議，但當時國家環境不同，倘若我不堅持一個中國，則其他許多大小國家均會作兩面承認，屆時我們亦無法阻止；又考慮國內人民之觀念，不得不堅持一個中國立場。法國方面也不接受美國所提兩個中國的建議，從其對我留守巴黎使館人員及文教組織陳源、趙克明代表下逐客令，並且堅持要我方交出大使館及總領事館房舍可以證明。

我一度擔任沈昌煥部長與賴特大使會談中法問題之紀錄，記得有次會談時沈部長講了一句「寧為玉碎不為瓦全」的古諺

，時賴特大使到華不久，對我中華文化並不了解，更不會明白玉碎、瓦全之含意；陪同美大使會見者為參事高立夫（Ralph George），他是位漢學家，經他作一番解釋後，賴特大使即答稱：「我覺得一片全瓦比碎玉值錢有用，你們為何不要？」由此可見中西文化觀念之不同。美方一直希望中法之間造成兩個中國，但事實上是不可能。當年蔣總統非常重視此案件之發展

，總統府秘書長張群經常坐鎮在外交部二樓部長辦公室，或在會議室兼會客室面授機宜，誤餐時僅以牛肉麵果腹；當年外交部在博愛路一六二號臺灣銀行行庫所在地上班，因部裏無餐廳，大家都就近到桃源街吃午、晚飯，該處牛肉麵因此而著稱。

處理中法斷交過程中，曾發生兩個小故事：

(一)承辦人朱震球是一等秘書回部辦事；這件斷交案公文累積了兩年多，已釘成五本大卷。他很得意表示：這是經典之作

會和聲明時，朱祕書剛好去桃源街吃牛肉麵，逐改由邱進益祕書寫稿。朱祕書回來馬上向我興師問罪，認為何以不等他回來寫。他若早點回來即可趕上，則五本大卷將全是他一個人手稿。

(二)中法斷交因涉及兩個中國問題，且在法國遲早會與我國斷交之情況下，我政府採取先斷交、先發布斷交公報策略，而法國於兩週後才承認中共。我政府對此事

件非常慎重，於一九六四年一月十日深夜召開中常會，經辯論後才決定斷交。記得斷交照會和斷交聲明是到晚上三點才定稿，送交打字員打字完畢已深夜三、四點，再由歐洲司司長薛壽衡召來法國駐華公使代辦薩萊德（P.Salade），面交斷交照會。當時那位打字小姐因剛新婚不久，先生很不諒解，對外交部頗為責備，後經歐洲司出函說明才解決這件「外交部欺負人」的糾紛。

派赴琉球慰問僑胞

擔任副司長期間，另一件重要工作是都必須要參考此卷，因為自一九五〇年英法斷交後，遷臺十五年來，這是第一個大國與我斷交。但當要寫到最後一篇斷交照

由美洲司主管，我承蒙蔡維屏司長關愛，

且由於歐洲司事務不繁，乃借調出差琉球，一共去了三次：第一次是一九六二年三月十四日至三月三十日，第二次是一九六年七月二十一日至八月八日，第三次是一九六五年十月二十七日至十一月十四日。

琉球群島因與我國有歷史淵源，故滿清時期視之為藩屬、保護國，後雖為日本所佔領，但日方亦有意將沖繩島以南之宮古列島、八重山列島歸還我國。光緒五年（一八七九），日本代表竹添進一來華試探修改中日通商約章，日本政府即有此提議。光緒六年，美卸任總統格蘭特（Ulysses S. Grant）乘船遊歷遠東，亦受北洋大臣李鴻章之託，向日本首相伊藤博文作類似建議，日方旋即接受。

光緒七年（一八八一）五月，日本訓令駐美公使告知美方，日本願意接受宮古、八重山兩群島劃歸中國之建議。同年八月至十一月，恭親王奕訢與日本駐華公使內戶機談判，訂立琉球草約，規定沖繩島以北歸日本管轄，宮古、八重山兩群島歸屬中國，准許自治，永不干涉，並約定光緒八年（一八八二）一月在北京換約再予批准。惟當時清廷各大臣

如陳寶琛、張之洞、李鴻章、左宗棠等意見不一致，朝議暫不批准琉球條約，準備於新疆問題解決後再反戈東指，對日作戰；結果彼此間無條約存在，造成日本繼續佔領琉球三群島之事實。

二次大戰末期，於一九四五年春發生沖繩島決戰，美軍共犧牲兵員一萬二千人、軍艦三十六艘、戰機七百六十三架，軍長也陣亡了才攻佔琉球群島；日軍方面拚死固守，兵員死亡十一萬人，被擊毀軍艦十六艘、飛機七千八百架，司令官自殺；僅僅為了爭奪琉球群島，即造成當地居民傷亡三十萬人，歷經三個月血戰。最後為提前結束戰爭，避免更多無謂的死傷，美國遂在廣島、長崎投擲原子彈。

二次大戰結束後，美國於琉球擴建空軍、海軍基地，並廣置飛彈營區，以支援西太平洋沿岸各國之集體安全，並全力建設開發；任何人對美方過去的戰績及戰後之努力建設，均應表示欽佩。早期美方曾希望我國在此設領事館，但蔣總統認為琉球原屬中國，地位不定，不宜設立領事館。後期我國雖擬開設，但因蘇聯也提出相同之要求，以便刺探美軍情報，致使美國婉拒我國開設領事館，以阻止蘇聯陰謀。

我國僑胞在琉球群島僅有一千五百人，除沖繩島多半為大陸撤退者外，宮古、八重山兩群島全為臺灣省同胞，其中八重山多為臺中縣市同胞。

日據時期，臺灣與琉球為同一政治領域，兩地人民往來無阻，貿易通商也無海關限制；可是戰後兩地交通阻隔，且互設關卡，僑胞並不了解政治形態已改變，由於往來不便，認為是我海關人員故意對返臺僑胞刁難，對我頗為不滿。（記得每次開歡迎大會，八重山群島的僑領林發先生總是說臺灣視他們為二等國民，讓人如坐針氈）加以日本人又從旁煽動，乃有集體歸化日本籍之活動；我外交部鑒於事態嚴重，又不擬開設領事館（過去是由長崎領事館兼理，但鞭長莫及），於是每年派員赴琉球慰問僑胞，並辦理護照延期事宜。

中島多為新僑，由廣東、上海移去，尚無入籍日本之問題，我們訪問僑團及重要僑商，並辦理了一千餘本護照延期或加簽，由於受到當地僑領林伯鑄、鄒祖焜、朱耀先、李臨、楊金登等協助，工作進行順利，圓滿達成任務。

當時沖繩島主要經營國際貿易，供應七萬美軍用品、食物，我國僑胞從事此項工作者為數不少，他們大多為廣東、上海人；由於我國處於戒嚴時期，護照法令甚嚴，無法迅速取得易地加簽，喪失許多商機，故對此多所抱怨。關於放棄中國國籍運動，則承八重山首席僑領林發老先生之支助，得以解決，林老先生當時已六十多歲，臺中人，在八重山經營鳳梨種植加工業，為人熱誠，甚孚眾望，在當地有舉足輕重之地位。他非常愛國，配合我們將八重山僑胞擬集體歸化一事打消，使我國地位升高，日本分化分子亦無法得逞。

三次訪問琉球中曾有一小插曲：美軍

交給其部隊拍照，以了解我僑胞出國之動向。但站在我國立場，當然堅持不將僑商護照交予他們，因此雙方為此經常起爭執，記得有一位韓裔美籍軍官尤其兇悍，為此事而不讓我們辦理護照加簽，且要我們離開；過了兩天，其部隊長芬尼根上校（Colonel John Finnegan）約我們一起午餐，席間談及抗戰期間，他曾在我國第十戰區安徽省立煌縣擔任領隊軍官，接應美國轟炸日本之空軍，對一位李司令長官的照顧，念念不忘；他所說之李長官適為本人岳父李品仙將軍，他知情後大表高興，頻囑代為致意；部下欲拍僑胞護照事乃自動取消，不了了之。返臺後，蔡維屏司長接受我的建議，邀請這位上校夫婦訪問臺灣，由家岳父李將軍在國賓飯店宴請他們，席間賓主盡歡。此位上校夫婦與我維持了三十多年關係，彼此互通音訊，對我推展琉球關係協助甚多，亦可謂為一巧事。

參加北極首航赴歐

一九六四年六月，我曾應德國航空公司之邀請，參加日本東京到西德法蘭克福之北極航線首航，當時臺北代理公司經理朱肇筠還請非洲司副司長殷維良同去，但因部內長官認為二個副司長同去一個無邦

交地區，似乎不太方便，殷副司長乃作罷；此外新聞局長沈劍虹亦受邀請，由其夫魏惟儀女士代表。我雖兩度在歐洲司服務，但從未到過歐洲，對轄區的環境並不認識，不似今日外交部主管人員可經常出訪轄區，實際了解地區情勢。當時由於經費拮据，出訪是一大困難。記得那時是乘坐七〇七型客機，自東京北飛，超越北極圈，下面一片白色，可稱為冰天雪地，甚至可見到北極熊。首先抵阿拉斯加加油，繼飛往丹麥哥本哈根，再到法蘭克福，打破過去東西飛之傳統，改由南北飛。當時我有一位表兄李承寬來接機，我們已近三十年未見，他是西德名建築師，曾在西柏林設計龍形之公共住宅二千戶，以及不少奇特的山坡屋。他曾在東海大學建築系授課，但拙於文字表達，且其設計天人合一的東方觀念，當時尚不易為一般人士所接受，遂又回到西德。德國法蘭克福戰後一片荒涼景象，僅存的旅館都使用公共浴室；此趟之行，除到法蘭克福外，又訪問海德堡、司圖加、慕尼黑、漢堡等各地，實地了解西德之奮發圖強精神，我覺得德人工作努力，吃苦耐勞，社會守法，今日得以再成為強國，實有其成功原因。